

顾立雅: 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美国汉学家

□ 谷文国 孔 扬

顾立雅 (Herrie Gleesner Creel, 1905—1994年), 是20世纪美国本土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他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不仅担任过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 奠定了此校的中国及东亚研究基础, 而且还担任过美国东方学学会会长, 在美国汉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占有重要地位。顾立雅终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教学、研究及著述, 在孔子学说、法家思想、早期中国文明等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用其弟子钱存训的话来说, 顾立雅是“美国学术界最早对中国语言和文化作精深研究的一位启蒙大师, 也是西方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权威汉学家”。

相较于欧洲汉学界, 美国在汉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晚。一般来说, 20世纪30年代之前, 美国并没有多少大学开设关于中国的课程。30年代之后, 得益于美国学术团体的大力提倡和一些基金会的支持, 渐有美国本土学者前往中国留学访问, 并直接与中国学者交往学习, 从而开启了美国汉学研究的新篇章, 顾立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尽管这一时期的研究延续了欧洲汉学的传统, 但影响深远, 给美国汉学界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博士期间, 顾立雅就对孔子学说产生了兴趣, 不仅跟着一位中国同学学习中文, 而且还以中国思想为主题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 题目就是《中国世界观的演变》。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在其回忆录中曾追忆, “顾立雅对古代和孔子十分崇拜”。为了更好地研究以孔子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之道, 顾立雅在毕业后由德籍汉学家劳福推荐, 进入哈佛大学进修, 跟从著名学者梅光迪研读中国古籍。得益于梅光迪的指导和帮助, 顾立雅在中文文献阅读和文章撰写方面有了质的突破。尤其是在顾立雅来到中国后, 梅光迪还无私地向其介绍自己的朋友, 使得顾立雅能够及时和第一流的中国学者接触。当时的著名学者如顾颉刚、杨树达等都在日记中提到过顾立雅。如顾颉刚在其日记中就多次提到与顾立雅晤谈、阅读其文章, 并且顾立雅《释天》一文是经顾颉刚审阅后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



1934年春, 顾立雅(前排右三)赴河南安阳侯家庄南地实地参观殷墟考古发掘现场时, 与甲骨文学者董作宾(前排右四)、安阳专员方策(前排右五)等合影

期的。此外, 顾颉刚还力荐顾立雅夫妇去天津任教, 可见顾颉刚对顾立雅研究水平的认可。1932年至1935年, 顾立雅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 跟随著名史学家刘节学习中国古文字, 并多次到安阳实地参观殷墟考古发掘, 不仅结交了李济、董作宾等一大批甲骨文学者, 而且还积极尝试借助新发掘的考古资料诠释早期中国文明。

经过几年的扎实学习, 顾立雅在中国留学期间出版了他的成名作《中国的诞生》。这本书依据当时新发现的考古资料, “对商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作全面介绍, 为最早在西方风行的一部中国古代史权威作品”。这本书是西方人较早利用甲骨文等对商周史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 给国际汉学界带来了持久的影响。谈到为何把研究重心聚焦在早期中国这一阶段, 顾立雅曾表达过自己的看法: “中国文化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非常值得研究, 这一历史仍然有迹可循、有物可证, 所以这一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如果我们想理解中国后来的历史, 就必须先厘清古代的历史……研究古代的源头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它的现在和未来”。顾立雅把书中引用的原始文献及相关的考古资料加以考订, 汇编成了《中国早期文

明研究》一书予以出版, 从而为后继者的持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 顾立雅对孔子的研究都是不容忽视的。他不仅出版了大量关于孔子的著作, 如《孔子其人与神话》《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国思想: 从孔子到毛泽东》, 还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中心加以探讨, 一方面旨在探求历史真相, 寻找真正的孔子; 另一方面是想要以此为基础, 把握中国之道的精髓所在。《孔子与中国之道》出版后被美国诸多大学列为重点阅读书目。

顾立雅对孔子的关注由来已久, 但深入的研究则要从他归美后才能算起。经过留学期间的沉淀和积累, 顾立雅认为传统说法在描述孔子时并没有做到实事求是。在他看来, 传统的说法认为孔子只是热衷于复兴古代的习俗, 把孔子描述为一个毫无魄力的人, 往往显得行为与思想相悖。顾立雅批评了这些看法, 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孔子。他认为真正的孔子“倡导和促进了一场彻底的社会和政治革新, 所以, 他应被看作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变革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顾立雅认为寻找真正的孔子“必须从新的角度研究”, 把孔子置于真实的历史脉络之中予以理解, 认识他所生活在其中的世界, “把孔子哲学当成

一个整体来看待”“了解作为它的中心思想之根源的某些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就要“依靠两种其他类型的材料努力寻找真孔子。首先, 尽管我们并不漠视在相对近晚世流行的种种传统说法, 但我们认为它们只具有次等的价值, 或者说是第二手材料, 而我们主要依赖的是产生于尽可能接近于孔子那个时代的有关他的记载。我们把基本的参考资料限定在孔子去世后的200年内。其次, 在每个主要观点上, 我们将格外留心这样的作品: 它们描述的是孔子时代之前的形势”。

在顾立雅看来, 孔子哲学的中心概念及其思想根源的东西正是“大道”, 它联结着孔子哲学的诸多方面, 构成了孔子的哲学总体, 并在整个中国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顾立雅认为以孔子哲学为核心的中国之道就是“修养道德和实践德行, 以及热爱大道并倾其全力在现实世界中实现它”。因此, 顾立雅鲜明地指出, 孔子绝不是复古主义者, 而是民主的先驱, 他为民主提供的不仅仅是一种哲学, 更难能可贵的是, 他能把彻底的热情和审慎的中庸之道相结合, 从而促进民主事业的有效实现。顾立雅高度赞扬了西方哲学家诸如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对孔子的崇高评价, 认为“在欧洲, 特别是在法国, 17世纪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 而转变之后, 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就像西方学者说的, “孔子就成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

顾立雅回到美国后, 亲自编制了一套《归纳法中文文阅读课本》, 极大地推动了美国汉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在学界享有盛誉的许倬云、钱存训等都是顾立雅的学生, 他们在传统汉学领域乃至中国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也进一步拓展了顾立雅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



冯如: 中国近代航空事业先驱

□ 邓田田



冯如是我国航空史上第一个飞机设计家、制造家、飞行家, 也是第一个飞机制造企业家, 被誉为“中国航空之父”。冯如的一生, 虽然只有短短的28年, 却带领中国航空事业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步, 是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探索者和先驱者。

漂泊他乡, 立下“航空救国”的奋斗目标

1884年, 冯如出生于广东省恩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让他从小就懂得了奋斗报国的道理。冯如12岁那年, 在美国旧金山务工的表舅回乡探亲, 见冯家饥寒交迫, 便带他出国做工养家, 从此踏上漂泊异乡的远途。

初到异国打工的日子历尽艰难, 他经常遭遇刁难、打骂和虐待, 还多次被无理解雇。艰难的处境、不公的待遇没有压垮他, 反而激发了他顽强的斗志, 他决心要改变中国人被欺压的命运奋发图强。虽然他当时经常工作时常高达12个小时以上, 回家依然挤出后半夜的宝贵时间来学习。目睹美国先进的机器和技术后, 他默然立下志向: “今中国贫弱极矣, 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

为了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学成报国, 他节衣缩食挤出学费, 进入夜校攻读机器专业。经过多年刻苦学习, 冯如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器发明家, 他不仅理论扎实, “三十六种机器无不通晓”, 而且于技术领域多有

突破。当时无线电通信技术才刚刚问世, 冯如改良的无线电传讯机就“能发能收, 电码灵敏”。他设计的小型发电机, 不但轻巧便捷, 而且效率倍增, 许多美国厂商都争相订购。

1903年12月17日, 美国飞行家莱特兄弟自制飞机试飞成功, 消息传来, 冯如顿感振奋不已。他敏锐地预料到飞机将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大有用途, 于是决定将研究方向改投至对国家更有用的飞机制造中去。“是(指机器研究)岂足以救国者, 吾闻军事利器, 莫若飞机, 誓必身为之倡, 成一绝艺以归殮祖国, 苟无成, 毋宁死。”当时, 飞机技术才刚刚面世, 欧美人也只将其视作一种新奇玩意, 并未发现其巨大的武器潜力。冯如却远识于未萌, 提出了“航空救国”的主张: “当此竞争时代, 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倘得千数百只飞机分守中国港口, 内地可保无虞, 微特足以固吾圉, 且足以慑强邻矣!”从此, “航空救国”便成了冯如人生的奋斗目标。

创办工厂, 成功研制中国人自己的第一架飞机

1908年5月, 冯如变卖家产, 又募得资金1000余美元, 在美国奥克兰市一间仅有7.4平方米的屋子里创办了广东制造机器厂, 开始试制飞机, 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飞机制造企业。他以莱特式双翼飞机为样板, 经过艰苦研发, 历时一年, 终于生产出第一架中国人试制的飞机。不料飞机试飞至数丈高时, 突然坠落在地, 冯如侥幸死里逃生。屋漏偏逢连夜雨, 恰在此时, 飞机厂房不幸起火, 冯如多年心血化成灰烬, 资金也所剩无几。他的父母听说他差点丧

生, 便来信劝他放弃航空志向, 回乡过安稳日子。冯如手捧万里家书, 毅然回信“飞机不成, 誓不回国”。

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他带领华工在野外搭建篷屋, 继续飞机研发事业。经过多次试验, 他终于在1909年9月21日, 成功飞起了由中国自主研制制成的第一架飞机——“冯如1号”。这一天, 距离美国莱特兄弟的成功试飞还不到6年。飞机迎着强风, 围绕一个小山丘飞行近800米。尽管飞机在设计上仍有不足, 但已展现出良好的性能。

1910年, 美国飞行家奥维尔·莱特及亚屈在洛杉矶进行飞行表演。为借鉴经验, 冯如专程前往参观, 不料表演者为了保守技术机密, 竟然拒绝参观者近前观察。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上的封锁, 愈发激发了冯如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斗志。回到奥克兰以后, 他日夜钻研航空技术, 图纸上的每一个细节, 都要反复推敲、多次试验, 在不断打磨中一次次提高飞机性能。终于在1911年初, 他又研制出一架新式飞机, 名为“冯如2号”并试飞成功。

“冯如2号”表现出的优秀性能, 证明由中国人自主开发的航空技术已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这一飞, 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 美国《旧金山星期日呼声报》用整版刊发长篇报道《他要为中国龙插上翅膀》, 详细介绍中国人冯如的伟大成就。此后, 冯如又多次驾驶飞机公开试飞, 其时速高达104公里, 飞行高度最高达200余米, 在技术水平上甚至超越了许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参观冯如飞行表演的外中人士数不胜数, 正在为中国革命而奔走的孙中山先生现场参观后, 激动地迎上去, 紧紧握住冯如的手, 兴奋

地赞叹: “吾国大有人矣!”

回国报效, 为祖国航空事业献出年轻生命

“冯如2号”试飞的巨大成功, 令无数海外华人鼓舞振奋。同时, 美国人也想用重金拉拢他。对此, 冯如断然拒绝。多年来, 冯如为探索航空科技出生入死、历尽艰辛, 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为祖国“壮国体、挽利权”。“壮国体”, 就是使国家强大起来; “挽利权”, 就是用武力打破帝国主义觊觎中国膏腴的妄想。“冯如2号”甫一成功, 冯如便召开公司股东会议, 快速办理飞行器公司迁返手续。1911年2月22日, 冯如怀着一颗火热的爱国心, 率领飞行器公司核心技术团队, 携带全部设备, 连同两架配备有最高级格塞林发动机的先进飞机, 乘船回国。

1911年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冯如立刻投身革命, 义不容辞地出任飞机长, 为加紧制造飞机投入北伐, 他立即于广州燕塘创立广东飞行器公司, 这是当时中国国内除南苑飞机工厂(1910年开办)外的第二家飞机制造公司。尽管冯如组建的军事力量尚未来得及投入战场, 清帝即被迫退位, 但著名飞机制造专家冯如的加入, 对壮大革命声势、推翻清朝腐朽统治, 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2年8月25日, 冯如在一次试飞中不幸罹难, 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祖国的航空事业, 他嘱咐助手说: “吾死后, 尔等勿因是失其进取之心, 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 年轻的冯如献出了宝贵生命, 年仅28岁。冯如去世后, 被葬在黄花岗烈士墓园, 以示纪念。

自20世纪初中国现代考古学兴起以来, 大量海贝与贝币相继出土, 引发学界对其与人类经济活动关系的一系列猜想。长期以来, 海贝被视作中国最早的货币, 通行于“殷周之际”。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海贝在先秦时期的货币身份受到挑战。

我国货币的“海贝起源说”拥有深厚根基, 包括罗振玉、李济、董作宾、王毓铨等在内的学者均持此观点。他们认为, 海贝从众多自然物货币中脱颖而出, 在先秦时期大范围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 是中国最早的货币。

海贝出土的范围与位置为该观点提供了直观证明。据《中国钱币大辞典》记载, 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到体现战国至东汉初期文明的江川李家山古墓群, 均有数目不等的海贝出土。王永生的观点颇具代表性, 认为随葬海贝的普遍性证明其已深入先民生活, 拥有货币职能。王毓铨根据周墓中大量海贝在棺外和殉葬器放在一起推测, 海贝作为货币财产殉葬。

经籍中不乏古人以贝为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有云: “农工商交易之流通, 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该记述奠定了后世货币叙事的主基调。西汉桓宽《盐铁论·币币》记载: “夏后以玄贝, 周人以紫石, 后世或金钱刀布。”此话言明夏后以黑贝、周朝以紫贝为货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有“古者货贝而宝龟, 周而有泉, 至秦废贝行钱”一语, 将司马迁所列六种货币简化为“贝”的一种。上述说法虽有出入, 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古人以海贝为货币的佐证和参考。《尚书·盘庚》中“兹有乱政同位, 具乃贝玉”常被用作间接例证。大意为我身边有失于德政之人任位, 一心聚敛钱财。此处“贝”被释作商代货币。

甲骨文辞和青铜铭文增强了该观点可信度。由罗振玉编的《殷墟书契》可知, 甲骨文辞中有许多关于囚贝、易(赐)贝、取贝的记录, 说明商人将贝视为“货宝”。在商周青铜铭文中, 经常出现“易(赐)贝若干朋, 用乍宝尊彝”的句式。这句话常被理解为获得赐贝若干朋(朋为货币计量单位), 用于购买原料、支付人工费用等以制作此彝器。如此, 海贝便是兼具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亢鼎铭文、遽伯盨铭文、袁卫盂铭文被认为是海贝为货币最有力的证据。以亢鼎铭文为例: “乙未, 公大保买大珠于梓亚, 才五十朋。公令亢归梓亚贝五十朋以鬱屏、鬯觶、牛一。”该铭文记录了用贝五十朋购买大珠的事件, 被黄锡全视作“西周早期用贝作为货币进行交易的最早最直接的文字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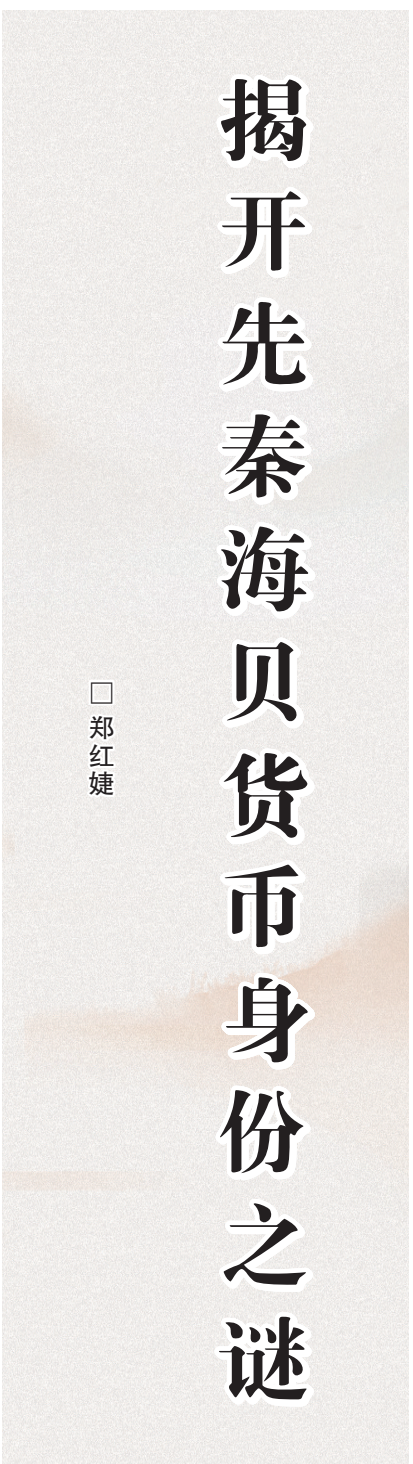
西周早期青铜鼎铭文, 8行49字

还有学者从文字构成角度入手寻找依据。许慎在《说文解字》“贝”字条下列出数十个从贝的字, 如贿、财、货、资、贷、赠、赏、赐等, 给后世留下涉及经济、商业、财富等的文字都从“贝”的印象。慧琳、张志淳、李大钊、卫聚贤等均承袭此观点甚至加以扩充, 用从贝汉字佐证海贝为货币。

结合社会背景分析也十分必要, 千家驹、郭彦岗根据夏代遗址出土文物判断得出, 夏代生产资料私有制已产生, 社会分工已达相当规模, 开始出现商品交换, 海贝作为货币正式进入经济生活。朱活从殷墟等地的发掘推测商代社会基本面貌, 指出商代后期农业和手工业劳动分工获得长足发展、商业开始出现并活跃起来, 随着交换的扩大, 海贝固定成为货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彭信威便对上述主流观点提出疑惑, 不过未能自洽。2001年7月, 中国钱币学会货币史委员会召开座谈会, 对前人研究进行了一定修正。近年来, 姚朔民、周卫荣、杨斌等学者努力摆脱“见贝即币”的思维定式, 认为不能简单地把海贝当作中国最早的货币。

根据出土位置定性海贝为货币的观点遭到反驳。杨斌在《海贝与贝币》一书中重点考查了商代精英含贝与握贝习俗, 认为其迷信海贝具有某种灵力, 可使人复活或不朽, 并非作为货币陪葬。2023年4月, 周卫荣发表题为《中国货币的起源与发展路径的总清算》的演讲, 以用于贝饰、口



□ 郑红婕

含、荒帷、马络头和玉组佩为例说明海贝首先是装饰, 强调海贝只是饰品与礼品层面的币。

一些专家对经籍的记载以及后人对经籍的解读提出质疑。如杨寿川在《贝币研究》中所言, 太史公有关货币起源的记述“带有很大的传说性”。文中没有提供有关“龟贝金钱刀布之币”使用的具体例证。姚朔民剖析了《盐铁论·币币》所记述的场景, 指明有关言论都是激辩时的发言, 没有根据。对于许慎“古者货贝而宝龟”的概括, 有学者指出“货”与“宝”都意为“以……为宝”, 前者并非指“以……为货币”。不仅如此, “具乃贝玉”不能通过字面意思简单理解, 不是聚敛钱财而是准备葬具之意。

甲骨文辞和青铜铭文被认为缺乏说服力或被误读。不少专家指出, 甲骨文辞太简短, 资料不充分, 不能就此下断语。在“易(赐)贝若干朋, 用乍宝尊彝”这样的句式中心, “用”不是动词, 而是介词表示原因, 意即受赐海贝若干朋, 因此制作彝器表示荣耀。彭信威发现, 彝铭记载的赐品(包括海贝)有二三十种, 它们不会都是货币。他还观察到, 赐贝数目与制造彝器大小无关。专家学者也对亢鼎铭文、遽伯盨铭文、袁卫盂铭文进行了再解读, 认为海贝只是抽象的“参照标准”而非真正用于支付。

从文字学角度寻找依据的方式也无法站稳脚跟。姚朔民在《中国货币通史》一书中整理出甲骨文中与“贝”有关的16个字, 考证出这些以贝为偏旁的字并不含有较强经济意义。杨斌表示, 以文字构成推论海贝为货币的方式混淆了财富、价值和货币的概念, 更何况这些“贝”不一定是海贝。

对于社会生产和商品交换发生的时间, 也未能达成一致见解。彭信威认为, 殷代是自给性农业社会, 不会有大规模商业行为发生, 不满足货币产生的条件。周卫荣强调, 西周社会重农轻商, 贝不大可能用于买卖交易。吴荣曾一直主张关注中国民族制度残余问题, 认为真正的生产大发展出现在战国时期, 那时才出现货币。

尽管存在上述分歧, 但学界都认可海贝作为贵重物品的价值, 承认它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海贝之所以在先秦时期成为一种贵重物品, 不仅在于其稀缺性, 还源于古人的生殖崇拜赋予海贝的精神价值。

上述相左的观点, 使得海贝在先秦时期乃至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成为一个待解之谜。或许如高晓明所言: “神秘的不是货币而是货币背后的社会关系。”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 我们终将揭开先秦海贝身份的神秘面纱。



从考古看文明